

GONGLI YU SHENMEI DE
JIAOGUANGHUYING
1895-1916 ZHONGGUO WENLUN YANJIU

功利与审美的交光互影： 1895-1916 中国文论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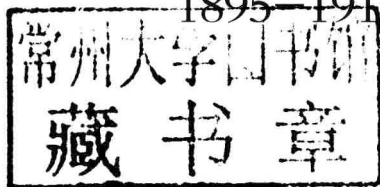
包莉秋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GONGLI YU SHENMEI DE
JIAOGUANGHUYING
1895-1916 ZHONGGUO WENLUN YANJIU

功利与审美的交光互影：
1895-1916 中国文论研究



包莉秋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功利与审美的交光互影: 1895~1916 中国文论研究
/ 包莉秋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643-2145-1

I. ①功… II. ①包…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理论—
研究—1895~1916 IV. ①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0913 号

功利与审美的交光互影:
1895—1916 中国文论研究

包莉秋 著

责任编辑	杨岳峰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四川川印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7.7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2145-1
定 价	24.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包莉秋的博士论文《功利与审美的交光互影：1895—1916 中国文论研究》的创新点也就是如题的三个关键词：1895—1916、功利与审美、中国文论。

先说“1895—1916”。任何论题都有一定的论域，而时间范围是论域之一，大凡讨论某个问题，总是要将问题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通常采取的办法或是按照朝代，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或是按照时间远近断代，如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等。然而上述做法总是有其不足，如果按朝代切分，那就很容易用政权更替的缘由遮蔽研究对象发展演变的自身规律和特质；如果按时间远近的断代来切分，那就太笼统、太粗疏，总之是很容易使得许多东西被掩盖、被遗漏了。因此我现在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即做史的时候，使用具体的、确定的年份来划定讨论问题的时间段，包括其起始和终止。因为年份是中性的、零度的，可以避免以朝代变更的外部规律遮蔽问题自身演变的规律之弊端；年份也是确定的、准确的，可以对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笃实精准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最初开题时与包莉秋商定，选取 1895—1916 年这一时间段的中国文论作为研究对象。开始在选择这一段中国文论的起点和终点时颇费踌躇，最终还是决定将起始年份放在 1895 年而不是 1840 年，将终到年份放在 1916 年而不是 1916 年之后。关于这些问题，包莉秋现在在此书中作了很好的解答，对于个中机理和缘由也作了很好的阐述，读者可以阅之。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处理怎么也比笼而统之地称之为“清末民初文论”或“近代文论”要好。

再说“功利与审美”。这是任何时候文学理论都脱不开的两极，当然这里所说“功利”包括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经济的功利。文学自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存在着是趋赴实用功利，还是满足审美娱乐这两种取向，总的说来，这二者相互平衡、协调的时候少，而相互失衡、龃龉的时候多，更多是总体上属于中间状态但或偏于功利或偏于审美的情况，当然也不乏极端的例子，即功利压倒审美，或审美拒斥功利的情况。某一时代的文学状况必然会影响到文学理论的总体倾向，使得文学理论经常像钟摆一样来回摇摆于功利与审美这两极之间，经常发生所谓“转向”，或者是功利转向，或者是审美转向。就前者而言，有社会功利转向、政治功利转向、伦理功利转向、经济功利转向等；就后者而言，有美学转向、形式论转向、心理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等。另外，在存在方式上也有表里、显隐、主从、强弱等各种构成关系及其表现形态。具体到 1895—1916 年的中国文论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出现了“功利与审美交光互影”的纷纭万状、摇曳多姿的景象。包莉秋的论文将其概括为功利性之始、功利性的延伸、回归传统的功利与审美、审美之途、功利与审美的兼顾、功利与审美的博弈、功利与审美的协调、以审美实现功利等八种情况，也就是八个阶段，这也就成为论文的八章内容，而它们与这 20 余年中涌现的重要人物、流派、著述、观点相互对应，蔚成了波澜壮阔的文学理论的大观。这可谓煞费苦心，也可谓十分精彩！

最后说“中国文论”。习惯上将“五四”以前的中国文论统称为“中国古代文论”，那么该书论述的 1895—1916 年间的文论当然属于中国古代文论，但是这一时段的文论与赓续了千百年的文论确有很大不同，关于时代背景、社会状况的不同以往所论颇多，该书也有不少论述，不再赘述。单就文论本身而言，与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此时西学东渐之潮勃兴，促使国人转换脑筋，更新观念，激活思想，开阔视野，然而这种思想观念的刷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个过程。对此时人多有论述，梁启超说：“‘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威，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

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始奋斗。”^①可见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始，西学输入中国，“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国人首先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以谋求变革维新。而到了 1895 年前后，这种变革的势头，终于突进了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上升到文学和文论。王国维于 1905 年这样说：“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②这种变革精神自器物而精神的穿透和提升，导致了文论在若干方面的变化，如文论体例形式的开新，文学研究方法的变更，文学研究目标的转换，文论功能取向的调整等。而此际的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蔡元培等人，都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和输入西学的实践，在重建中国文论方面都作出了引领风气、推助潮流的杰出贡献。

上述三个方面的创新点基本达到了之前开题时的预期，彰显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故而当包莉秋将全部书稿寄我以求序时，我欣然应命，写上以上数语，以示祝贺，同时也预祝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取得更突出的佳绩！

是为序。

姚文放

2012 年 12 月 21 日夜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1-72 页。

②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年版，第 530 页。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功利性之始：梁启超的文学功用观	032
第一节 梁启超思想概述	032
第二节 梁启超的早期小说功用观	042
第三节 梁启超文学功用观的意义	051
第二章 功利性的延伸：“小说界革命”	
影响下小说理论的功用观	054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的政治功利性	054
第二节 从 1895—1916 年小说报刊的 办刊宗旨看小说的功用	061
第三节 对政治需要下白话文运动的再反思	072
第三章 回归传统的功利与审美：	
林纾的小说功用观	078
第一节 林纾的小说功用观	079
第二节 林纾小说理论方法研究	087
第三节 从“林译小说”的影响反观林纾的小说功用观	092
第四章 审美之途：王国维的文学功用观	097
第一节 王国维的知识结构	097
第二节 “无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	100
第三节 “无用之用”的审美性	104
第四节 王国维与蒋智由的悲剧观之比较	107

第五章 功利与审美的兼顾：革命派的文学功用观	115
第一节 概 述	116
第二节 徐念慈的小说功用观	118
第三节 黄人的文学功用观	124
第四节 黄世仲、黄伯耀兄弟的小说功用观	131
第六章 功利与审美的博弈：国粹派的文学功用观	139
第一节 国粹派及其文学功用观概述	139
第二节 章太炎的文学功用观	145
第三节 刘师培的文学功用观	154
第四节 金天翻的文学功用观	166
第七章 功利与审美的协调：鲁迅的文学功用观	173
第一节 鲁迅早年思想概述	173
第二节 “不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	177
第三节 “不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之比较	185
第八章 以审美实现功利：蔡元培的早期美育思想	189
第一节 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190
第二节 蔡元培的早期美育思想	193
第三节 王国维与蔡元培早期美育思想之比较	198
第四节 以审美实现功利目的的美育思想述评	203
结 语	206
附 录	213
主要参考文献	229
后 记	238

绪 论

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发生、发展必然渗透和反映不同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追求以及实用或功利的目的。或者说，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肯定有其自身的有用性，不然，就不足以解释一代代知识分子何以乐此不疲、甚至为之奔走呼号。对于文学这种有用性的不同认识，产生了不同的文学功用观。在我国文学和文论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文学功用观，如“诗言志”、“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无用之用”、“不用之用”、“为人生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每个时代的文学功用观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这些功用观却不外乎教化说、审美说两种。

一、古代文论中的文学功用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文学功用的着力强调。古人对文学功用的论述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即教化功用和审美功用。也可以这么说，教化功用和审美功用是贯穿中国古代文论史始终的两条主线。

1. 教化功用

在秦汉时的文论中，就流露出浓重的教化功用思想，只不过由于当时文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这种功用观主要是针对诗歌文体而言的。《诗经》已有这种思想萌芽，如：“家父作诵，以究王讻。”^①孔子是最早通过评论诗歌明确提出文学具有政教功用的理论家，如：

①《小雅·节南山》，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①又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②在孔子看来，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等社会作用，可以帮助统治者有效地治理国家。

其实，上古典籍中也早已有重视文学教化功用的记载。如《尚书·虞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舜帝命乐官夔用诗乐教育宫廷弟子，把他们培养成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道德品格的人。可见“诗”在当时是作为政治教科书而被使用和重视的。

汉代的《毛诗序》是一篇集中体现儒家政教功用观的诗学论文，其云：“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③这段话明确提出了诗歌的功用在于“教化”。诗歌具有教育感化人的作用，是安邦治国的有效工具，统治者可用它来“乡人”、“邦国”。这种教化还可以对夫妻之道、家庭人伦关系、社会风俗及礼仪等发挥重大作用。郑玄的《诗谱序》也强调诗歌的政教功用，认为诗歌的功用在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④。这正如清人程廷祚评价的：“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⑤王充也云：“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很显然，他把评判文章价值的标准直接归于“用”上。

魏晋南北朝时，随着“文学的自觉”的出现，对文学功用的阐

① 《论语·子路》，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② 《论语·阳货》，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③ 《毛诗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④ 郑玄：《诗谱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27页。

⑤ 程廷祚：《诗论十三再论刺诗》，《青溪集》卷二，据《金陵丛书》本。

述已从诗歌转移到文的身上了。曹丕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把文学的功用提升到了经国治世的层面。刘勰的《文心雕龙》单从“原道”、“宗经”、“征圣”等篇目名称就可看出其文学功用具有浓厚的儒家教化味道。

经历了六朝注重审美功能、崇尚绮靡之风的文学观，唐代又开始恢复文学的教化功用观，于是掀起古文运动。陈子昂谈到其原因是：“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②明确反对齐、梁间诗之“采丽竞繁”，并认为正是这种现象导致诗歌“兴寄都绝”。实际上，这里是不同的文学功用观的对立。“采丽竞繁”，是追求文学的审美功能而忽视其教化功用，也就是说对文学的内容重视不够。而“兴寄”恰好就是文学作品的内容，正是后来所强调的文章所载之“道”。针对这种现状，为了恢复文学的教化功用，韩愈提出“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的主张。“文者，贯道之器也”^③、“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是一技耳”、“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④、“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⑤……这些倡导或论述都是从强调文学教化功用的角度，或强调“贯道”，或强调“教化”，或关注现实，其说虽异，其实一也。

时至宋代依然关注“文”与“道”之关系，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提出了著名的“文以载道”说，他认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

①《典论·论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

②《与东方左史刘修竹篇叙》，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③李汉：《昌黎先生序》，《昌黎先生集卷首》，据《四部备要》本。

④《唐文粹·与徐给事论文书》，据《四部丛刊》本。

⑤《与元九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久已。噫!弊也久矣。”^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张文章要以道为主,不能只顾及文采等形式而舍本逐末。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认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②,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实现了道文合一。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③也就是说,“文”就像树之枝叶一样,是从“道”这个树根中长出来的,所以“文”中自然发出的都是“道”。朱熹的“道文合一”理论从形而上的角度显示出对于文章教化功用的强调。明清时期,教化功用论仍为理论家们所提倡,如:“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④、“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⑤……

19 世纪前期,对文学社会作用阐述的最详细的是魏源:“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百官万民,非此不丑;君臣上下,非此不牖;师弟友朋,守先待后,非此不寿。夫是以内亶其性情而外纲其皇极,其纍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伦,其穷极之也动天地而感鬼神,文之外无道,文之外无治也;经天纬地之文,由勤学好问之文而入,文之外无学,文之外无教也。执是以求今日售世哗世之文,文哉,文哉!”^⑥用从前的文之标准“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来衡量,他认为现在被人称颂的文简直不能称之为文。可见魏源是很注重文的经世致用功能的。

①《周子全书》第二十八,据《正谊堂全书》本。

②③ 朱熹:《论文上》,《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5、3319页。

④ 顾炎武:《与人书》之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据《四部丛刊》本。

⑤ 沈德潜:《说诗碎语》,《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14页。

⑥ 魏源:《学篇二》,《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5页。

2. 审美功用

美学、美术、美育等有关美的术语是在 19 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而被引进中国来的^①，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美学思想成分却是博大精深的，对“美”的论述很多，“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从文学功用而言，古代的审美功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文学具有审美娱乐功能^②，另一类大多是从文学的形式、语言、技巧、风格等方面探讨文学审美的。在此简要回顾第二类的发展过程。

先秦文论中“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其实可以将其理解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审美与教化功用的关系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儒家，他们强调“文”、“质”并重，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③为证。

赋是汉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对于赋的作者来说，一般具有内容方面的追求，希望能够通过其作品劝谏皇帝，实现其“治世”（功利）目的。但实际上由于赋本身的形式特点，赋的文体以其铺张扬厉的形式取悦人、吸引人，其效果则是所谓的“劝百讽一”，以至汉武帝在读了《大人赋》之后“反缥缥有陵云之志”^④。所以扬雄以此为“童子雕虫篆刻”^⑤。故汉赋从作品本身和阅读效果来说，是倾向于注重形式的审美功能的。

魏晋以降，从“人的自觉”走向“文学的自觉”，文学的审美功用亦被人们所阐发。曹丕言道：“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⑥“诗赋欲丽”，明确了文学追求形式、注重审美功能

① 具体内容可参阅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近代中国新名词源流漫考之三》，《文史知识》，2000 年第 1 期。

② 可参阅吴建民：《古代文学功用价值论及其当代意义》，《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 年第 4 期。

③ 《论语·雍也》，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1 页。

④ 班固：《汉书·扬雄传》，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卷八十七，中华书局影印，1983 年版，第 1509 页。

⑤ 扬雄：《法言·吾子》，据《四部丛刊》本。

⑥ 《典论·论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 60 页。

的方向。“缘情说”首见于陆机的《文赋》，其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①“绮靡”，说明了诗的形式因素及其审美价值。钟嵘的《诗品》则建立了以审美为中心的诗学理论，尤其是“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②的“滋味说”转变了先秦两汉以来以儒家政教功用价值观为主的局面，意味着自此审美功用价值观成为文论家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萧统在《文选序》中认为文学作品有“入耳之娱”、“悦目之玩”之功用，明确指出文学作品的审美愉悦功用。以沈约为主要代表的永明声律论，其实是从作为形式的文辞角度对审美功用作的阐述。强调文学作品的形式，其实就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虽然六朝时极关注文学形式因素的理论，在唐时受到严厉批评，但形式美因素在唐诗创作中却真正得到了成功地表现。

当然，即使在唐代掀起古文运动，大谈“道”的时候，也有文论家注重对审美经验、审美范畴等的探讨。“意境”作为一个术语就是此时由王昌龄提出来的，皎然则以禅论诗。晚唐的司空图是从“味”这一感官经验出发谈诗的，他认为：“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醢，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③应该说，文学的审美功用开始关注人的情感世界，开始探索文学活动中人作为主体的主观感受。或者说，文论不执着于具体的技巧理论，而是追求形而上的境界。

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兴趣”说，实质也是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他说：“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

①《文赋》，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7-68页。

②《诗品·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

③《与李生论诗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页。

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①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解释说，严羽此说“无非力图描述出诗歌中的形象应该空灵蕴藉、深婉不迫，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令人神往而不要太落实”^②。也就是说，严羽是在强调艺术的作用在于其审美形式，而不是现实内容，在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上影响较大。

明代茶陵诗派的代表李东阳反模拟、主性情、尊李杜，强调诗以声调为主，就是从诗歌的审美角度来论诗歌的。李贽的“童心说”反对虚伪的封建道德，崇尚发自童心、真心的真情实感，批判了“载道”的文学观，也具有重视审美功能的倾向。清代的“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等大体上都注重文学作品形式的作用，实际上也是比较注重其审美功能的表现。

以上是按时代顺序对古代文学的教化和审美功用分别进行了一番梳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互不相干的。它们共同贯穿于古代文论的整个过程中，只是有时侧重于教化作用，有时又侧重于审美作用。当某一方发展过于极端或泛滥时，文论家会执另一方来纠正文风以引导文论、文学朝健康或常态的方向发展。

二、1895年：文学功用观发生转变的一年

纵览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这半个多世纪的文论，与先前文论相比并无多大差异。碍于篇幅，不一一展开。即使有关注现实、反映时代的强烈要求，但终究大多是关于文论自身发展的理论主张。这段文论从内容到形式变化虽有，但并不是很大，而甲午战争后文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功用观自然也随之改变。

1. 国家动荡不安，西学输入，文学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工具

本书为什么选择1895年作为起始时间而未从1840年开始呢？

① 《沧浪诗话·诗辨》，《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②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

原因如下:甲午战争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以“自强”、“求富”为初衷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给当时国人本已麻木的神经予以了致命性的刺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道:“‘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威,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始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①这段话生动描述了 1840 年后西学输入中国的景象,正如文中所言:“始则工艺,次则政制。”众所周知,1840 年鸦片战争使中国人从失败中惊醒,开始向西方学习,最初引起人们普遍注意的是西方社会的自然科学技术,实用是西学东渐的主要思潮,于是广设学堂、兴建兵工厂、选派人员出国留学,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于新学引进的过程,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在北京保国会演说辞里也曾仔细描述过:“……国初时,视英、法各国皆若南洋小岛。……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轮舟初成,横行四海,以轮船二艘犯广州,两广总督卢敏肃以三千师船二万兵御之而败。……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败于定海舟山,裕谦、牛鉴、刘韵珂继败……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八年、十年,屡战屡败,输数千万,开十一口,乃至破京师,文宗狩热河,洋使入住京师,亦可谓非常之变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视之,深闭固拒。同治三年,斌椿遍游各国,等于游戏,无稍讲求之者。曾文正与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开制造局译书,置同文馆、方言馆、招商局……甲申之役,张南关之功,日益骄满。……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翻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1-72 页。

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渐渐讲求，自强学会首倡之，遂有官书局、《时务报》之继起，于是海内缤纷，争言新学，自此举始也。”^①

中国人向来是看不上外国的，但随着节节战败，才逐渐真切地意识到西方的强盛。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利，使中国人终于主动地大量引进西学，以探求强国之路。但是，科学技术在当时占据主流，这一时期的文学却为大多数人们所遗忘。因为文学的价值在于“怡情遣兴”，无“救弱救贫”之用，自然难入人们的实用视野。

可见，自鸦片战争始至其后一段时期内（即1840—1894年）文学的价值并未引起国人的关注，这种境况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最终以中国战败才有所改观。1895年，以维新人士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维新人士与“自强运动时期（引者按：即洋务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改变……”^②维新派人士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淫，也曾试图通过科举走向仕途，但西方国家的不断侵略、中国封建王朝的腐败、国家在战争中的屡次重创以及西方文化思潮的不断涌入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思想也与传统士人有所不同。他们试图通过改良社会以挽救日益垂败的国家命运，但由于自身尚游离于主流政治话语中心之外，空有政治抱负却不能“通过自己的话语建构来实现国家的繁荣与民族的振兴”^③。这就更使他们意识到仅靠引进自然科学、依靠统治者的力量使国富民强是不可能的，只有首先“开启民智”，国家才有可能富强起来。故他们的政治策略渐渐有所转向，这就是从自上而下的改革转向自下而上的革新。

① 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7-238页。

② 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4页。

③ 李春青：《文学理论与言说者的身份认同》，《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